

第一章 家族、父亲和儿子

1

家族和家庭的背景在任何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学与心理学上的意义，在文化危机的中国和文化殉道者的家庭更是如此。

梁漱溟一生始终处在传统卫道者的位置上，始终怀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意绪关注当下与未来，具有崇高的道德意识和拯救社会的使命感。这一切，不能不与他的家族背景与父亲的影响密切相关。

梁漱溟，原名涣鼎，字寿铭，又字漱冥，以漱溟行世。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即 1893 年，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其祖籍在桂林，至祖父一代，做官到北京。

根据梁家旧谱的记载，梁家本为元朝宗室，最早可查的祖先是元朝皇室也先帖木儿。也先帖木儿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元十七年，即公元 1280 年，他被袭封为云南王，后改封营王，所以有人认为梁氏一系即为营王后人。也先帖木儿及其子以宗室先后受封为右翊万户，是当时炙手可热的贵近重臣。

元朝灭亡时，宗室重臣大都逃回漠北，也先帖木儿一系不知何故流落到河南汝阳。明朝初年，留居中原的元宗室后裔纷纷更名改姓，依从汉人。也先帖木儿一系五世成公，便以所居之地汝阳旧属大梁区域，取“孟子见梁惠王”一语改姓梁。

天朝时代，梁家星系中出过不少耀眼的星座。到梁漱溟的爷爷梁承光，依然辉煌耀世，他既是杰出的学者、诗人，也是优秀的骑手和军事战略家，曾任内阁中书，35 岁在山西防堵捻军，瘁力而死。

至梁漱溟父亲梁济，已是梁氏第 23 代。此时家庭已失去昔日的荣耀和财产，但并没有失去古老思想的载体和社会卫道士的职能。在祖辈的影响下，梁济获得了与生俱来的秉赋——传统的道德忧患意识。

梁济，举人出身，先为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后补侍读。他为人忠厚、认真，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和道德约束，即使一个人在家时，也总是衣冠整齐，从不懒散地躺在椅上。他对国家、对传统有极强的责任心。这些，给了梁漱溟最初的影响。

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梁济的态度却是信任而又放宽的。

梁漱溟有兄妹 4 人，一个哥哥，两个妹妹，父亲对他们总是宽大的。梁漱溟生而孱弱，又多罹灾病，未到天寒，往往手足发冷，五六岁时，常患头晕目眩症，亲友老觉此儿不会长命。或许是这个原因，父亲对他格外放宽。小时，哥哥挨过打，梁漱溟一次也没挨过。父亲很少正言厉色地对待他。在父亲面前，他是自由的。

梁漱溟 6 岁时，父亲延请了一姓孟的先生于家中讲授地球韵言，讲述世界大势，内容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之类的知识，一反以儒家经典课童子的蒙学传统。

光绪帝变法次年，福建人陈 铎 在北京创办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济让梁漱溟进入了这个学校。在这里，既念中文，又念英文，梁漱溟感

到很有意思。梁济当时认为，中国旧有知识分子积习太深，全由旧的教育所致，因而他曾告诫学子们将出洋留学当作一件正当事去做，甚至“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

父亲教儿的方式，也是别具一格的。梁漱溟 9 岁那年，有一次将自己积蓄的一小串儿钱串儿丢失，多日寻不见，到处吵闹。几天后，父亲于庭前桃树上见到了，知道是儿子自己遗忘的，便用纸条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写后交给梁漱溟，并不作声。梁漱溟很快省悟，赶紧跑到桃林，一看，果如其然，不禁自怀歉意。至他年岁稍长，父亲更不予干涉。文化观念是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又是开放的，这两点对梁漱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2

梁漱溟第一次与中国传统思想富有意义的接触，是阅读梁启超编辑注释的《德育鉴》。这是一本儒家修身格言汇编，书中的“立志”、“涵养”、

“内省”、“克己”等修身格言，给了他很大影响。因这方面强烈地折射出他父亲的人格，梁济给梁漱溟取了一个绰号，曰“尚吾”。

中学时代，梁漱溟还获得了“傲”、“贤人”之类的称号。当时，他读的是北京“顺天中学堂”。此为北京最早建制的中学之一，名为中学，课程却比现在的大学还深，学生年龄差别亦很大，梁漱溟的同班竟有大他一倍的。当时，班上几个较小的同学，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梁漱溟，曾结为小组自学。廖为大哥，经常司勉励之职。有一回，一阵起劲的谈话后，四人一同到酒楼吃螃蟹、喝酒。兴之所致，廖提议，彼此以后不必兄弟相称，代之依每人短处所命新名，借此警惕。此议一出，即获赞同，大家纷纷请他命名。于是，他给王的是“懦”，给姚的是“暴”，给梁的是“傲”，自名为“惰”。

他们的自学速度，总是超过老师的教授速度。如英文，老师只讲到一半，廖已将全书读完，梁漱溟也能学三分之二。代数、几何、三角等课，老师开个头，廖即能自学下去。在他的带动下，梁漱溟也总跑在老师的前面。国文课，梁漱溟似乎不太注

重，但奇怪的是，成绩偏偏很好，作文有时还考第一名。他总是喜欢作翻案文章，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也彻底失败。一次，70岁的王老师恼恨至极，在他作文卷上批曰：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另位范姓老师却偏爱他的作文，批下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叹。

廖对梁漱溟自学影响甚大，而在人格、思想上对梁漱溟的影响，后来的郭人麟远超过了他。

郭为河北乐亭人，年长梁漱溟两岁，班级则次于他。开始，彼此无往来，直到第3年方始交谈。郭颜貌如女子，见者无不惊叹，眉宇间有几分沉忧，见解超凡脱俗。梁漱溟当时很自负，救国救世，建功立业，气概看似不凡。但在人生思想上，并不成熟。对于古今哲人之思想成果，往往拒绝领会，并且对文学、哲学等非实用性学科，亦排斥之。思想偏激，听不进别人意见。而郭天资绝高，虽年轻，学问几近老宿，对《老子》、《庄子》、《易经》、佛典皆有心得，且非常喜欢谭嗣同的“仁学”。梁漱溟非常崇拜郭人麟，尊其为郭师。郭的谈话他订了一大册，题曰“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他们，奉之为“梁贤人、郭圣人”。

中学毕业后，梁漱溟在另一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加入了京津同盟会。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后，转入《民国报》做事。这时期，梁漱溟曾因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对社会不满，有过自杀的念头。

一次，梁漱溟在家闲来无事，偶然从旧书堆中捡到一本《社会主义之神髓》的书，书的作者为日本近代著名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基本内容是阐述《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主要观点。该书在本世纪初很流行，影响了不少激进分子。

梁漱溟将该书粗翻了一遍，并没产生浓烈的兴趣，但书中一些反对财产私有的话，深深印入心中，使他不断思索这个问题，把他引向反对私有财产的路子上。他觉得，财产私有是引起人群中间生存竞争的根源。由于生存竞争，我们常常受到生存问题的威胁，不免巧取豪夺。人类实在是应该这样的，这是财产私有制的恶果，不能全责备哪一个人。想来想去，梁开始对私有制产生憎恶，甚至憎

恶得难以忍受。他用几乎仇视的目光，寻找着这世界不公平、不平等的证据。

一天，他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头。寒风中，老头吃力地拉着车子，步履蹒跚。车内衣冠楚楚的年轻人不耐烦了，大声催他快拉。老头一慌，重重地跌倒了，鲜血顺着白胡子流了出来……看到这里，梁漱溟掉下了眼泪。从此，他再也不坐人力车了。

还有一天，梁在路上行走，看见两个警察用绳子牵着一个小偷，并不时打打骂骂。可怜兮兮的小偷，激起了他对私有制度的憎恶。这是私有制度的罪恶，与小偷有什么关系，治末而不治本，又有什么用处。他越想越气，甚至想冲上去将小偷放走。此时的梁漱溟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不是很多，但对私有制度的强烈愤恨迫使他去深深地思考。1912年冬，他写了《社会主义粹言》一书，并亲自用腊纸刻写，油印了几十本，分送给同学朋友。在这本书中，他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在中国之倡导，绝非无病呻吟，而是情势所逼。认为，于形形色色的救国方案中，惟有社会主义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剂良药。

不久，梁漱溟为考留学生而回广西，路过南京下关。当时的下关非常繁华，酒肆林立、商贾云集、游客如织，一片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景象。他和同伴合住的客店——江边第一楼也很奢华，房钱每人每天一元五角，再加上吃饭开支，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种奢侈的生活，梁漱溟很不习惯，整天闷闷不乐。大街小巷里叫卖乞讨的凄惨景象更使梁漱溟难以目睹，他使用睡觉来掩其耳目，但笙歌盈耳，吆五喝六的喧闹，又使他难以安眠。

梁漱溟心里的烦恼越积越多，又无处诉说，于是精神失常，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幸而同室的朋友赶回来早，才避免了惨剧。

梁漱溟自杀得救后，他的人生观发生了一次大转变，开始热衷起佛家生活来。

其实这不是偶然的。梁漱溟从懂事开始，就善于思考问题，许多事情都有他独到的见解。十四五岁时人生问题就使他非常困惑了。那时，家里的女佣天天做饭、洗衣，在他看来辛苦得很。但问她是否辛苦，她说习惯了，并不感到苦。他自己呢？家产富足，又是家中的小儿子，备受父母疼爱，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但内心深处却常常

非常苦闷。这是为什么？他反复思索、仔细观察。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欲望无穷尽，一个满足了，另一个又来了，很难全部满足。这是他思索的结果。有的人坐轿子、坐马车，称得上荣华富贵，坐不起轿子和马车的人则步行。坐轿子的乐、走路的苦吗？不一定。坐轿子的可能正为某个难题发愁，步行的人正自得其乐呢。这又是他观察的心得。当年，北京琉璃厂是一条文化街，那里的文明书局和有正书局是梁漱溟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翻阅、购买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的木刻佛经，以及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开始，他并不懂得什么大乘、小乘，什么密宗、禅宗等，是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使他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使他刻苦研读佛书，久而久之，便渐渐入门了。不仅如此，就连日常生活，他也按照佛家的要求来规范了。18岁那年，拒绝父亲为他订婚，19岁开始吃素。

梁漱溟一生重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二是人生。前者不顺，后者滋生，一转而入佛家思想，便自然而然了。

4

父亲梁济的自杀，打破了梁漱溟平静的内心生活，几乎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

1918年，北京的一个萧瑟的早晨，梁济神色庄重地走出了书斋——在那儿他度过了孤独的不眠之夜，来到西城积水潭畔，纵身跳进冰冷的湖水之中，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天，距梁济11月14日60岁生日尚差几天。梁济选择生日之前自杀，是别有意味的。梁济24岁取得举人功名，但直到1898年结婚并有了4个孩子后，才得到一个内阁中书的官职。其间，为了生计他当过私塾先生、满族贵族的家庭教师和在京官员的私人幕僚。在内阁任职到1906年，他得到一个管理外城巡警总厅刚刚建立的外城教养局的机会。1908年嫡母病故，梁济辞官守制，再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

梁济的自杀，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可能就已下了殉难的决心。当时，他和一群广西遗老在銮庆胡同粤西会

馆行礼，庄重地向神明发愿，将以死来捍卫传统的风俗。在家里，他独自一人跪在祖宗牌位面前，向他已去世 40 多年的父亲发愿，“当发明正义，不敢辱亲”。他痛心的不是君主政体和满清王朝的推翻，而是“风俗”和“正义”的堕落。贵族血统的使命感，儒家泛道德主义的信念，使他对现实发生的一切产生了困惑。自杀似乎是他可以尽力发挥对社会的道德影响的惟一出路，是可以挽救堕落中的道德准则的希望，他下决心去死。

这年 10 月的最后一天，梁济去亲戚家还清了所欠很久的 20 元银元，还拜访了一位老师，并给老师提前送去了生日礼物。11 月 7 日，他一大早就起了床，说是到朋友彭诒孙家住一两天。正当他准备出门时，碰到了梁漱溟。父子二人谈论起刚收到的欧洲消息。梁济问：“世界会好么？”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一天天会往好处走的。”梁济点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说完就走了。

一连两天，他没有回家。梁漱溟等家人有点着急，眼看生日就要到了，只好到积水潭畔的彭家去接，梁济拒绝同行，说明天自己回去。当晚，他挥笔写了整整一夜，完成了他的《敬告世人书》。天

蒙蒙亮，他穿衣出门，对仆人讲要去积水潭做例行的清晨散步，一会儿就回来。一小时后，正当仆人着急时，一个警察发现有一顶普通的蓝色帽子浮在积水潭最北边的湖面上。

像梁济期望的那样，他的死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一生的努力。重要报刊都刊登了他自杀的消息，一些重要的人物写了诗文和挽联。事件过去很久，有关文章、颂词和评论，还不断刊登出来。一位仍然居住在故宫的满清太傅，以此上奏皇室，颁发诏书，赐谥褒奖。甚至国务总理也写了一幅还愿匾。许多年后，还可以看到一些人在积水潭旁烧纸钱和哭泣。

甚至一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陶孟、徐志摩等，也被梁济的自杀行为感动了。

父亲梁济的自杀，对梁漱溟来说，打击是沉重的。当时他就深责自己不遵循中国文化传统和父亲教诲的行为。连续好多年，在父亲自杀的纪念日，他都毫不掩饰地痛哭流涕。

梁漱溟早年走向激进，又皈依佛教，都是违背父亲心愿的。可以说是父亲的自杀重新唤起了他作为家族传人的使命感和对父亲的愧疚，激起他重新

选择的意念。也是从梁济自杀起，梁家延续了 800 年之久的士宦家传戏剧般地结束了，梁漱溟肩负起了新的文化使命。

第二章 从菩萨到儒家学子

1

梁济自杀的第二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时，教印度哲学的年轻教师梁漱溟正处在这个中心。

梁漱溟没上过大学，没留过洋，却以 24 岁的年纪，执北大教鞭，在当时颇为不易。当时的北大，群英荟萃，群贤济济，不仅大量的新派人物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执教于此，各路名学宿儒如刘师培、陈汉章等也拥有讲坛。区区无名小辈的梁漱溟，得以跻身于此，说来纯属偶然。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究元决疑论》，文章的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独崇佛学。恰值此时，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从欧洲回国接任北大校长，途经上海时，正好看到这篇文章。因蔡平素爱好哲学，也希望此次到北大着重办好哲学系，遂对梁漱溟的文章发生兴趣。

蔡元培到北京后，经教育总长范源廉介绍，梁漱溟带着《究元决疑论》慕名拜会蔡元培。蔡元培对梁漱溟的学问与见识表示赞赏，并希望他能到北大教书。过了不久，蔡约请梁漱溟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校长室会见，并正式聘梁为北大哲学系讲师，教授印度哲学。对这一聘任，梁漱溟感到心里紧张，说：“我只是喜好佛学，对印度哲学留意不多，怕不能胜任。”蔡答道：“你固然不甚精通印度哲学，但也没发现别的人比你强；你不是爱好哲学么？我也爱好，还有其他不少爱好者。我就是想把这些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商讨、研究办好哲学系，你是其中一个，不能不来，不必担心难担当这个职位，只权当来这里研究、学习好了。”这番话，讲得梁漱溟心服口服，便答应来北大任教。

当时，梁漱溟正给司法总长张耀曾做机要秘书。由于当时南北组织统一内阁，往来函电极多，经常忙到深夜，哪有时间做准备、写讲义呢？只好征得蔡先生同意，暂缓到北大，课程由梁漱溟推荐许季上暂代。不久，北洋政府改组，张耀曾下台，梁亦去职南游。10月返京时恰逢许先生大病，学校自暑假开学后一直缺课，蔡先生促他到校接替，梁漱溟便正式到了北大。

在北大，梁漱溟主要开设“佛教哲学”、“印度哲学”等课程，并发表了不少有关佛教的著述。后来，又陆续开授儒家哲学、孔学绎旨等课。他在演讲中反复讲，他来北大，就是要为释迦、孔子说个明白的。

梁漱溟当时的心思和精力远不止放在讲这些课上，而把注意力集中于东西方文化及哲学的研究上。他当时苦于没有人将东西文化并提，相比较。有的朋友就讲，这题目太泛、太大，无从着手。梁漱溟对事情的态度是一旦决定，不肯随便放弃，便产生了征友会师的念头。1918年10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一份《征求研究东方学者》的启事，大意为：东方之学即指佛陀与孔子之